

評 Emily Mokros, *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News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280 pp.

張雪 \*

直到今天，隱秘(secretcy)和高壓仍然是研究清代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關鍵詞，而文字獄和奏摺制度則是兩個無法迴避的主題。然而墨安劣(Emily Mokros)的新書卻從邸報入手，另闢蹊徑，討論清代政治中「監管性的透明」(curated transparency)。在本書中，作者用「邸報」(gazette)泛指流傳於士人之間、摘錄政府文書的小冊子，而用「京報」(Peking gazette)特指清代在北京地區出版的邸報。本書從十七世紀早期，清政府恢復邸報出版為起點，探討了邸報長達兩個多世紀的興衰史。墨安劣認為，在清代邸報的政治影響力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滿族統治者利用邸報建立了一套有別前代的秩序(information order)。在這套新秩序下，漢族士人可以通過閱讀邸報實時了解政府動態，而政府則通過邸報有選擇性地公開訊息、提高政治參與度，從而籠絡漢族菁英，維護自己統治的正當性。這套訊息秩序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不斷經受考驗，也不斷進化，但

---

\* 美國里德學院助理教授

最終隨著帝國的衰落而崩塌。

第一章描述了清帝國以邸報為中心，重建訊息秩序的過程。早在唐代，地方豪強就普遍向長安派駐人手。這些人負責收集京城情報發往地方。到了宋代，有鑒於晚唐地方勢力的急劇膨脹，中央政府嚴密控制了政治傳播的路徑。中央政府開始向地方官員派發邸報。而明代的中央政府無意嚴格規範邸報的內容和流通。一旦某政府文書得到批覆，各級官員就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查看、轉錄。到了明中葉，中央政府近喪失了對邸報這一媒介的控制。即便是朝廷官員也不得不依靠私人渠道獲取必要訊息。明清易代之後，滿人政權以京報為中心，重建了帝國的訊息秩序。在清代早期，政府文書的流通主要由內閣和六科兩大機構負責。當政府文書得到皇帝批覆後，內閣會挑選出部分文書，作適當編輯刪節。隨後這些文書會被移交給六科給事中，由六科給事中監管京報的出版事宜。各級地方官員如需獲取京報，則需依靠提塘官。省級官員如總督、巡撫等往往向京城派駐提塘官，而府縣官員則需往省城派提塘官。至十七世紀晚期，康熙開始利用奏摺與個別官員聯繫。與之前的政府文書相比，奏摺最大的特點在於其私密性。奏摺可直達天聽，無需經內閣和其他官僚機之手。這樣一來，皇帝就可以通過奏摺，與自己的心腹直接交流。但到了十八世紀上半葉，部分奏摺也被允許通過京報，在更廣闊的官僚系統內傳播。

第二章討論了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在重建訊息秩序的過程中遭受到的一系列挑戰，而又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在這一過程中，君主希望能夠絕對掌控訊息秩序，而大臣卻在京報之外，通過各種非正式渠道獲得真偽難辨的訊息。一直到乾隆早期，這種君臣角力才以乾隆的勝利暫告一段落。康熙試圖通過奏摺，確保機密訊息只在極少數官員之間傳播。然而在康熙末年九子奪嫡的背景之下，政壇雲波詭譎，不少官員買通書吏、以求窺見奏摺內容。即使是享有特權、可以

使用奏摺的高官，也通過各種渠道打探消息，以期謀求更大的利益。雍正對朋黨政治和洩密行為深惡痛絕。他成立了軍機處，規範了奏摺的流通，又下令將部分公文編撰成書，試圖用官方訊息抵禦流言。到了乾隆中期，隨著軍機處地位的穩固和奏摺制度的完善，某些奏摺的片段開始出現在京報裡。與之相對的，洩密行為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相比他的祖父和父親，乾隆能更加遊刃有餘地影響帝國的訊息秩序。

在第三章裡，作者分析了商品經濟和市場在帝國訊息秩序中的突出地位。中央政府決定了京報的內容，但是在傳播領域，主導者卻是商業書坊。內閣、軍機處等機構決定了哪些文書可以出現在京報上，但中央政府並不直接參與京報的印刷和發行。墨安劣指出，書籍史研究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認為所謂的「官刻」、「坊刻」涇渭分明，但京報的例子告訴我們，這一所謂的界限是極為模糊的。中央政府為京報提供素材，但京報的印刷和銷售卻是市場行為。在著名的琉璃廠興起之前，印刷京報的書坊集中在紫禁城的宮牆外，靠近中央政府的各辦事機構。至少有三家印刷京報的書坊位於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之外。它們靠近內閣，是書吏出入的必經之地。但也有書坊位於北城東南角的報坊胡同。這些書坊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央政府一度涉足京報的出版和發行，但這些嘗試並不成功。乾隆中期之後，書坊和書吏勾結，出版未經政府授權的公文的事件時有發生。針對這一現象，中央政府加強了對書坊的監管，並推出了「公慎堂」官商合營的新模式。即政府派代表駐公慎堂，打理書坊內京報出版的各項事宜。然而政府對公慎堂的掌控並不持久。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公慎堂都更像是一個商業機構，而非一個政府部門。

第四章討論了邸報的閱讀情況。墨安劣認為官員和普通的士人均可通過閱讀邸報有所獲益。對希望進行史學著述的人來說，邸報無疑是

珍貴的史料。對官僚和渴望步入官場的人來說，邸報可以幫助他們迅速地掌握必要的行政知識和技能。幾乎每一個官僚都需要撰寫上行文書。而在撰寫這些文書的過程中，他們經常需要引用邸報中題本、奏摺的片段來闡發自己的觀點。除了作為官員們撰寫公文的參考外，京報還是他們的工作指南。通過閱讀邸報，官員們可以迅速了解到他們職業生涯中可能會遭遇到種種難題、包括自然災害、征收賦稅、斷案量刑等。邸報中的實例可以使他們掌握基本的應對之道，避免貪腐、失職等指控。最後，邸報還提供實時的人事訊息。這些訊息對於宦海浮沈中的士大夫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以上四章從清史研究的角度，討論了邸報的內容、傳播以及消費。而本書的第五、六章則將邸報置於更廣闊的背景中，探索了這一媒介在中西交流、碰撞中扮演的角色。第五章細緻地描述了邸報進入西方視野的漫長過程。作者認為十七世紀以來，西方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這種興趣逐步發展，到十九世紀早期，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十七世紀海上貿易的急速增長和傳教士來華為標誌；第二階段以鴉片貿易為契機；第三階段則由十九世紀早期的漢學家們所推動的。在這一過程中，隨著物質交流的深入，西方希望能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而邸報成為他們了解清帝國政治的重要窗口。

來華傳教士是邸報重要的讀者群體。生活在北京的傳教士們採購京報，而在其他城市的傳教士們也可以購買到當地出版的邸報。邸報為傳教士們提供了他們最為關心的訊息，包括關於基督教的新政策、氣象天文和其他自然現象等。傳教士也利用邸報收集地方官員的訊息，以期與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十八世紀末以來，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利用邸報蒐集有關中國的情報。1809年東印度公司聘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名嫻熟中文的傳教士，擔任翻譯和中文教學工作。在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的二十餘年間，馬禮遜翻譯了大量的邸報。邸報因而成

為了英國東印度公司關於清帝國最重要的情報來源。馬禮遜還將邸報作為語言學習教材，用來培養下一代商業和外交人才。在十九世紀早期，邸報的翻譯本開始在英國本土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流行起來。邸報的內容經常出現在歐洲的主流報紙上，吸引了學者和其他社會菁英的目光。

第六章考察了十九世紀中晚期中西之間所謂的「訊息戰」(information wars)。清帝國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遭遇到了一系列危機。與太平天國的內戰使清政府陷入到空前的困境。戰爭造成中央、地方之間溝通渠道的阻塞。與此同時，清政府開始嚴格審查邸報的內容，以掩蓋頹勢。清政府隱瞞真相的行為令西方讀者沮喪。長期以來西方讀者都是以邸報為媒介、了解清政府的最新動態，然而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他們不斷懷疑邸報是否還能繼續提供可靠的「公共訊息」(public information)。一些西方官員則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介入邸報的編輯出版。總體而言，邸報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衰落無可避免。隨著新式報紙在通商口岸的出現，邸報的權威性受到了極大衝擊。

近年來邸報頗受學者矚目。除墨安劣的這本專著外，尚有 Lane Harrison 編譯的 *The Peking Gazette: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和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的專著 *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sup>1</sup> 學者們對邸報的關注很大程度上緣於全球史的興起。當史家開始將清帝國作為早期近代(Early Modern)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放在全球史的視野下進行考察時，他們往往需要審視物品、人口、宗教、思想等跨區域性的

---

<sup>1</sup> Lane Harrison, comp., *The Peking Gazette: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Leiden: Brill, 2018); Nicolas Standaert, *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Leiden: Brill, 2022).

流動。考察物品和人口的流動需要找到流動的路徑。而考察宗教、思想等抽象事物的傳播，需要明確他們的物質載體。邸報是訊息流動的一種重要載體。邸報不僅僅在清帝國內部的不同區域內傳播。通過翻譯，邸報還在清帝國和歐洲之間傳遞消息。長期以來，邸報研究的一大阻礙就是材料的匱乏。邸報原件，特別是十九世紀之前的邸報，罕有存世。除了邸報的內容具有很強時效性外，邸報本身往往紙張粗糙，印製疏陋。一般讀者均是閱完即棄，收藏者寥寥。而根據邸報編譯而成的西文材料尚有相當數量。在清代早期，邸報主要由傳教士翻譯，經由書信寄回歐洲。而中後期之後，譯者開始變得多元。Harrison 所編譯的邸報選集中的英文翻譯大多來自十九世紀在華出版的英文報紙。主要的翻譯者也從早期的傳教士變成了英國駐華公館中的工作人員。這些翻譯材料是研究中西交流的絕佳材料。

墨安劣和鐘鳴旦均是從邸報翻譯著手，研究中西訊息的流通。然而兩書關注的時段不同，側重點也有所差異。鐘鳴旦的研究限於康熙乾三代。鐘書主要關注的是邸報的翻譯史和接受史，故事的主角則是傳教士和歐洲讀者。比如鐘書第二章談到法國耶穌會士龔當信(Cyr Contancin)對邸報的翻譯影響了法國著名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對君主制度和理想政府的思考。第三章則是討論歐洲讀者，乃至於法王路易十六，是如何從傳教士的翻譯中獲知《四庫全書》的編撰和清帝國其他的政治文化活動的。墨安劣則歷述了邸報從清帝國建立到帝國覆滅，超過兩個半世紀的興衰。墨書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五、六章，涉及到邸報的翻譯及其對西方的影響。比如墨安劣在第五章中提到傳教士的翻譯附被收錄進各種介紹中國的文集中，激發了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制度理想化的想象等。但是墨書的分析始終以清帝國為主要場域，並不在翻譯、流傳過程上過多著墨。討論的重點也最終落在邸報是如何在西方的衝擊下走向式微的。

另外，除了從翻譯文本出發討論具體的中西訊息交流外，墨書還從「訊息秩序」這一概念入手，暗示了在訊息領域內，存在著某種跨區域的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這種早期近代性的屬性之一就是訊息的去中心化。「訊息秩序」是本書的核心概念之一。這一概念來自於英國史家 C.A.貝利(C. A. Bayly)出版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名著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而貝利則是受到了經濟地理學家柯斯特(Manuel Castells)關於訊息技術討論的啟發。訊息的生產、蒐集、傳播共同構成了訊息秩序。在貝利看來，訊息秩序不能脫離自身的政治、經濟語境，但也有著某種獨立性(autonomy)。相似的經濟體內部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訊息秩序。基於英國殖民政權在印度的經驗，他認為近代早期社會中的訊息秩序都是「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sed)，國家並不是絕對的主導者。<sup>2</sup>墨安劣對邸報的研究回應了貝利去中心化的論斷，暗示了在訊息秩序領域內，存在著某種跨區域的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長時間以來，歷史學家傾向於強調清政府無遠弗屆的權力。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下，漢人知識分子承受著尤其巨大的政治壓力，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最近二十年以來，學者們開始逐步修正這種敘事。羅威廉(William Rowe)等歷史學家對「乾嘉轉型」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十九世紀早期就有意識地放鬆了對某些領域的管控。<sup>3</sup>

在此基礎上，墨安劣審視了清帝國訊息秩序中政府權力的邊界。政府並不是清帝國訊息秩序唯一的參與者。誠然，滿人政權對漢人知識分

---

2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6.

3 參見 William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32:2(December 2011): 74-88.

子心懷戒備，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被排斥在帝國訊息秩序之外。邸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面向漢人知識分子的政治傳播工具：邸報完全採用漢文、也鮮少在漢地之外的邊疆地區發行。清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一味的限制訊息流通並不是明智的做法。在進行言論審查的同時，清政府通過邸報策略性地公佈政府文書，實現了「監管性的透明」。這種透明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漢人知識分子的參政需求，從而維護了滿人政權的正當性。此外，本書還揭示了訊息秩序中商業邏輯和政治權力的共謀與衝突。儘管清政府利用邸報進行政治傳播，清政府卻並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完全支撐邸報的出版發行。邸報在北京乃至於在全國的流通必須依賴商品經濟的力量。因此邸報既是政府的工具，但同時也是一件商品。商業書坊與政府合作，但仍然遵循商業邏輯。因此，書坊的某些行為與政府利益恰是背道而馳的。比如某些書坊為了刺激銷量，與書吏勾結，導致機密公文洩露。

總體而言，*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是一部以小見大的專著。全書圍繞著邸報展開，但最終著眼於邸報背後盤根錯節的政治傳播網絡。從古至今，政治傳播是任何幅員遼闊的帝國都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清帝國的訊息秩序並非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控，而是多方共謀和妥協的產物。儘管這一秩序在十九世紀現代化浪潮的衝擊下，最終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它展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與柔韌性。

(本文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收稿；2022 年 7 月 20 日通過刊登)